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七期 ——  
(二〇〇一年八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8 a)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印红标
【历史资料】怀仁堂会议(“二月抗争”)记录(节录)	师东兵
【见证历史】文革与人生	张 敏
【坎坷人生】崇拜的代价	冯骥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 【研究报告】

#####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 印红标 •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份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

#### 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仅次于此的就是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即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强化执政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位重要的任务，即中共中央“十六条”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中的后两项任务。这方面内

容，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知识分子与领导层、与工农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党内主导的思想是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绝大部份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意味着，在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在政治方面，并未予以信任。党政领导，特别是地方和基层领导，通常是在强调经济建设时，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着重对知识分子进行审查、批判和改造。基本的事实是，批评领导人往往要冒严重的政治危险，而批判或伤害知识分子则很少承担实际责任。现实助长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宁左勿右”的认识和作法。就整体而言，领导层基本能够，甚至乐于接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错误估计，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作法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

在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政权的战略思考当中，知识分子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重视反对拉科西那样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警惕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敌对势力。官僚主义造成人民的不满，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则足以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颠覆政权的政治力量。至少从1957年以后，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交织出现。1957年春夏，政治风向由重点整顿党内官僚主义开始，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主要在党外，多为知识分子）告终；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斗“党内走资派”，二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所向，不外这两者。

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中远非同舟共济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和矛盾状态，耐人寻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三个月，1966年5月至7月，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而知识分子则是被批评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当时，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文比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少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这段时间，党政各级主要领导人主持了对大批知识分子和部份文教界领导（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揭发、批判和斗争（注：在1966年6至7月，经中央或地方党委批准，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知名学者、文学艺术家周谷城、罗尔纲、贺绿汀、秦牧等。见此期间各地报刊。），很多人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积极性。与地方和基层领导的态度相关，一批工农兵模范人物、先进分子也被发动起来进行大批判。运动的态势近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时，领导层大多没有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未发生严重的对抗，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领导“文化”的革命。联系长期以来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以及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同年8月至9月，大批知识分子和文教界领导人受到红卫兵的粗暴凌辱和残酷伤害，却很少得到领导方面即当权派的有效保护。此时，大部份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虽然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可以影响多数派群众，但已经感到了政治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指责很多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少数派学生也向党政领导挑战。在风云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不少领导人力图跟上形势，摆脱被动，而不愿为保护政治上不那么可靠的知识分子承担风险。

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运动的方向，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当权派”，由

此，当权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而众多知识分子却得以暂时逃避巨大的政治压迫，不少人还得到了“革命群众”的名份。其中一些人“逍遥”于运动之外，很多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则变被动为主动，参加了群众组织，批判斗争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冷落、压抑或者伤害过他们的当权派。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也一度被搁置一旁。当然，文教界领导人的处境因其当权派身分而依然如故。

知识分子处境的相对宽松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调整政策，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斗争目标——党内“走资派”的暂时结果。在当权派的阻力被冲垮，批斗“走资派”形成大气候以后，从1967年夏季起，再度强调批判学术权威，只是其地位次于对“走资派”的批判。1968年以后，在逐步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辜地扣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政治帽子。同年夏秋，批判的矛头扩大到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但已经令毛泽东失望的红卫兵大学生，也成了“从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注：见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9月1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以及同年7月至9月发表的有关文章。〕1966年发动群众时还曾见诸报端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小将”之类赞誉消失了，代之以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宣传。知识分子的社会形像被丑化，知识分子从此自嘲为“臭老九”。

笼统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批评主要是1968年夏季以后，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与派遣工人群众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及文化单位的行动同时进行的。显然，作出这一决策和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社会性矛盾有关。长期以来，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差异和隔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在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时，工人群众往往是可资调用的社会力量。1957年反击右派的一篇重头文章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1968年姚文元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新战略部署的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注：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57年6月10日、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二者的历史作用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两篇文章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从这以后，不仅少数“学术权威”，而且为数众多的一般知识分子，也与被打击的领导干部的命运开始接近。他们在“牛棚”，在五七干校，有了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共识。进入70年代，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群体，逐渐在厌恶“四人帮”、反感“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 二、群众运动与社会矛盾

“文化大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群众运动相比，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而是由毛泽东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政各级领导者发难，斗争其中所谓走资派。可以说它是一场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的造反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群众曾经表现出高涨的政治激情，追究其原由，固然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随大流心理或者担心落后被整的恐惧，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存在矛盾。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1967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有这样一段谈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有些干部为什么

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注：《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7—9月）。〕毛泽东在这里触及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干群矛盾的长期存在；第二，这一矛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激化，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毛泽东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但这两点确实是分析群众造反行动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植根于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积郁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

毛泽东从领导干部作风，进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解释并力图解决这一矛盾。1957年，他发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反对执政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60年代中苏论战，中共中央曾提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由党政领导干部当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以高额收入和各種特权，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苏联与中国社会模式的相似性必然使人们联想到中国，或者反过来说，正是中国的现实影响着人们对苏联问题的看法。1964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注：转引自谭宗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批判》，见谭宗级、郑谦等编：《十年后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此后，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但是1965年1月，中共中央在“二十三条”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反复使用的关键词语。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有关社会矛盾作了这样的表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社会矛盾的这种分析为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提供了武器，曾经吸引和鼓动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群众。

毛泽东在理论上把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纳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将其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相应地，崇拜毛泽东的群众也把反对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压迫、铲除官僚特权、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的斗争。这一点在当时群众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反映。例如一篇北京市中学生的文章写道：“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与特权人物之流的惊心动魄的阶级矛盾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特权人物，他们的社会基础及卫道士联动之流——构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殊死的搏斗，构成了这次文化革命的矛盾双方。”〔注：“赤潮”：《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新四中》报，1967年5月17日〕今天看来，敢于正视而不是回避社会矛盾是毛泽东的不同凡响之处，然而他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不足为训，并且足以

造成动乱的。

毛泽东在前述1967年视察讲话中提到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问题，是造成群众与领导干部矛盾激化和严重对立的直接原因。在1966年6月开始的大约4个月中，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直接领导或间接控制运动。在此期间，除了打击文教界领导人外，还打击和伤害了一批普通群众，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恐惧。（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6年8月10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会中南组会议上说：6月至7月下旬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另外，1966年8至9月，很多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打击、迫害了一批群众，例如北京六中等学校红卫兵私设劳改队，关押、残害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本校师生及其他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中，北京六中劳改队被解散，被当作“资反路线”迫害群众的典型。见（北京）六中遵义兵团：《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2月。）同年10月，毛泽东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要求为那些在初期运动中被打击和伤害的群众平反，恢复名誉，群众中被压抑的不满和愤怒得以爆发。前4个月被激化的矛盾如同烈火，随着政治风向的逆转，反过来烧到了领导者身上。由于“资反路线”是通过党政组织体系贯彻的，因此几乎全部党政领导人都被批判为犯了路线错误，批判“资反路线”也就突出地表现为群众“矛头向上”批判领导的强大风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看似纠正错误，实际上是以一种“左”的错误代替另一种“左”的错误，把运动引向全面冲击党政领导体系，导致全面的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这类现象并不罕见。

对比1957年和1966年的政治运动，颇具启发意义。1957年整风鸣放中群众的激烈批评，激发了领导人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扩大打击面的强烈冲动；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初4个月有领导地在群众中“横扫牛鬼蛇神”，造就了群众造反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1957年和1966年运动结构类似而方向相反，当权派与批评当权派的群众，作为动力或对象的角色顺序颠倒而逻辑相似。

批判“资反路线”对发动群众参与党内斗争的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由此真正获得了向“走资派”进攻的现实社会力量。不满现状的学生、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中结成冲击当权派、揪斗“走资派”的联合阵线。他们真心相信，是毛泽东把他们从当权派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又一次成了被压迫者的“大救星”，从而，毛泽东的路线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了。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叫作“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然而，在激烈的干群冲突中，支持群众造反必然招致领导干部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赢得群众的广泛响应，则势必招致领导层的反抗。对很多党政领导人来说，运动从批判“资反”路线，才真正变得不可容忍。事实上，只是在运动的格局变成群众斗领导以后，在领导层才出现了明显的抗争。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打击文化教育界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时，党政领导中除了劝告红卫兵不要违反党的政策之外，很少尖锐的批评（注：见1966年8至9月中央领导人接见群众时的讲话，参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10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越来越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冲击。11月叶剑英等老师起而批评，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二月抗争”中所猛烈抨击的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不要党委的领导、夺权、冲击解放军等问题都是批判“资反路线”的直接产物（注：“二月抗争”的记录，见宋琼等：《所谓

“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刊载于1979年2月26日《解放军报》。）“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 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的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又是调动亿万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虽然与政治矛盾相比，社会矛盾是次要的，但是它给“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印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社会矛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处于初期阶段。“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于党内斗争，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7年，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0年。旧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影响尚未退去，人们对新制度、新矛盾的体验和认识刚刚开始。1966年，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不久，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和改善，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

其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退一步说，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群众除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很难找到其他思想武器。因而，不论当时群众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他们，包括造反派，在思想上都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可悲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上上下下盛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崇拜。但是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对运动的不尽一致的期待。运动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运动冲击他人时，许多人很坚定，很积极，很“革命”，或者尚能跟着走，并不怀疑运动方向的正确性，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或者危及自己所属的群体，才产生了对不理解、苦闷、怀疑及至不满和抗争。考察分析人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不同问题上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差异，有助于理解和辨别平时隐现的社会差别和矛盾，以及不同群体的真实利益所在。

社会矛盾毕竟不同于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实际运动中必须十分审慎，防止“政治革命”变为社会革命。他们一方面放手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一些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批判群众中的“极左思潮”，以保证中央战略部署的实现和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等等。当时被批判的“极左思潮”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把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当作官僚阶级予以否定，并号召社会革命（注：《中国向何处去？》（长沙，1968年1月6日），见（广州）工革联印刷系统委员会《广印红旗》编辑部：《广印红旗》，1968年3月）。

历史唯物主义一向注重考察政治运动的社会根源，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席卷全国，有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更应当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对群众为什么曾经以高昂的激情参加运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从考察介入“文化大革命”较深的社会群体：领导干部、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入手，试图说明社会性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存在和作用。相信这方面的努力会推动“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最终有利于总结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北京100871）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历史资料】

怀仁堂会议（“二月抗争”）记录（节录）

• 师东兵 •

2月16日，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闹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周恩来拍了桌子，让他回来）陈毅说：

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 原载《张春桥在狱中》，繁荣出版社，香港，1997年

~~~~~

#### 【见证历史】

文革与人生

• 张 敏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八月的烈日下，被自己的女学生（那些一向被公认是好学生的女孩）乱棍打死的时候，我和王友琴同是该校学生。也正因为生命中同有过那样的时刻，在历经三十五年人生跋涉之后，我和王友琴今天才相逢在这里。

记得校长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召开了学生斗学生的“批斗会”。头天夜里，班文革成员到我家通知说：“你明天要是敢不去开会，格杀勿论”。一夜之间，同学分成三类：打人的，挨打的、只许坐在地上看的。武斗以我所在的初二四班下手最狠，女孩子打女孩子，皮带棍棒、拳脚相加……十个“黑五类”学生被长绳拴成一串，我在其中。身上被泼了墨汁、又带著多处伤痕，我不敢回家，更觉没有颜面再见班里同学，生出自杀念头，但想到不久前妈妈刚自杀身亡，扔下我和十岁的妹妹，我要是死了，爸爸和妹妹会更伤心，这个家里不能再死人了。第二天，我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长、老师们挨打……卞仲耘校长就这样死于非命，她是北京市的中学里打死的第一位校长。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生了更多这样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和五日，留给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以致在后来很多年，每到这日子，我会特别写几句话，或是一篇祭文，祭奠死者和永远失去的原来的我。一个听话读书的孩子，突然成了社会所不齿的异类，我痛下决心，要弄清那些“主义”、“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与生俱来的兴趣。这一变，铸成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这一变，再也没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三十五年来，无论从我的人生经历中，还是从调查研究中，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文革对共产党来说，是常态的聚焦，而不是变态的偶然。但是，文革对经历过



的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或者干脆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人、乃至与之相关的几代人的生道路，甚至使其中相当庞大的人群，无法逆转地脱离了人生的常态。

由于发言时间限制，这里扼要将文革如何改写了千百万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这一考察研究思路简述如下。

## 一、文革与失学

文革使偌大中国当时所有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于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失学。以后十一年，全国高等院校没有正常招生，毛泽东的这一“大手笔”，实在是旷古奇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帝王，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做过这样的事，敢做这样的事，毛泽东做了。

尽管随著毛泽东的逝世，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七七、七八级录取的新生中，包括部份“老三届”，这是否意味著十一年正常招生的空白就此得到填补了呢？那时流行很多鼓舞人心的说法，如“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重获上大学的权利”、“把文革的损失夺回来”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虽然后来有些“老三届”进了大学，那不过是占了本应七七、七八年入学的年轻人的位置。文革中大学十一年没有招生，是一个绝对的空白，它无可改变地最终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今生今世上大学的机会。

以一九七七年高等院校招生总数（273,000）乘以十一作粗略估算（本应以一九六五年加一九七七年再除以二平均，暂未查到一九六五年确切数字），可粗知，当代中国人中约有三百万本来可以进大学的人，只因“赶上”十年文革，结果终身未能接受高等教育，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的他们，自小学或中学失学，多年务农做工之后，最先被抛进下岗失业大军中，无声无息地被埋没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可以确知，在无法抹煞的数字背后，一定有三百万个（粗估数，若按动态统计，十一年高等教育如果正常发展，可容纳学生数应逐年递增，所以实际总数可能更多）被十年文革完全改写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个人际遇、社会地位，每天的工作，生活内容因此才成为后来的样子。

即使是那些以后有幸能进大学的文革经历者，大都经过多年蹉跎，人生正常的程序被打乱。由于种种局限，很多人未必进入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就算是读成了硕士、博士的，也常有人感叹，因文革失学，到现在仍留下知识结构不完整的痕迹。没学过化学、生物学的人文学科硕士、博士；没学过地理、历史的理工科硕士、博士，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遗迹。

至于文革时期已经大学毕业的那代知识分子，大多在十年内无法从事专业工作，被迫把最富创造力的年华消耗在粗重原始的劳动中，他们的人生道路同样是被文革改写过的。

现在已经有研究者把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群体称为“索偿的一代”，“长身体时正挨饿，要升学时就停课，十年下乡献青春，回城没有好工作，身体渐差人渐老，公费医疗取消了，既无住房又缺钱，下岗偏又轮到咱”，是这个群体的写照。他们究竟要向谁“索偿”？那是一笔能偿还得了的债务吗？

## 二、文革对当代中国人的性向，婚恋，家庭生活的影响

### 1. 文革对男女性向的误导

文革高潮期的时尚：女中学生头发剪得极短，甚至剃光头，穿男式上装，挽衣袖裤管，手持军用皮带，赤脚走路，口中骂著原来只有男人才骂的脏话，以示“彻底革命”。

文革十年，除后期少数军队文工团员得到特许（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偏偏在“军队”，这个照理更多阳刚之气的地方），大陆女性被禁止穿裙子、烫头发、穿高跟鞋、用化妆品。开山劈岭的大寨铁姑娘，是当局为全社会妇女树立的楷模。如此误导，造成一代女性（当今约在四十五、六岁至五十六、七岁之间者）在步入青春时期时，接受的是以不美为美，以显露女性特征为耻的异化教育。女青年长时间穿清一色（或蓝或黑）直筒式上衣，更为时兴的是穿四个口袋的男式上装，既显得威武，又可使青春女性丰满的胸部和腰身曲线不至于太引人注意。在那样的年代，很多女性变得粗糙生硬，失去女性的温柔，男性也同时弱化了体恤、爱惜、保护女性的男性性向与责任感。今天，当男女互相指责：“中国没有淑女”，“中国没有男子汉”的时候，研究文革对全社会男女性向的误导达到什么程度，此后又如何影响人的一生：婚恋，家庭等等方面，不无社会学价值。

## 2. 文革对当代很多中国人婚恋的影响。

文革年代，从官方宣传到文学艺术，一律讳言爱情。无论是书面上，还是生活中，只要与性、爱情有关，统统被斥为“黄色”，都在被批判之列，甚至有的人仅仅想了有关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就会挨批斗。当然根本谈不到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性教育和婚恋辅导。文革十年的中国舞台，荧屏上仅有的八个“样板戏”，主人公不是童贞，便是鳏寡。长此以往，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就连很多已婚男女，也完全没有关于性、恋爱、婚姻的起码常识。究竟是什么力量，出于什么目的，就连对人的本能，也要去践踏、压抑、毁灭！

再者，文革中，“血统论”藉暴力与恐怖大行其道，与“黑五类”通婚的危险与代价，使很多有情人望而却步，或忍痛分手。十年文革拆散了多少美好姻缘，又让当今中国多了多少对错配的鸳鸯，当事人最刻骨铭心。

文革中，一千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家庭，亲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长期被禁锢在与原生活环境差异很大的穷乡僻壤。正值妙龄的男女知青，很难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择偶，“将就”成婚在所难免。即使本村本队有意中人，因当时实行知青一旦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的政策，真要选择一个人，不言而喻的附加条件就是永远留在那个贫穷偏远的地方，通不过这道关的情侣，也都分了手。

知青们在“下乡”与“返城”两次狂潮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为生存嫁给不爱的人；为回城抛开所爱的人；为爱情放弃发展的机会；为“互助”而接受同居……无论怎样选择，每一杯都是苦酒。当时从长计议，暂时不作选择的人，抑或铸成至今单身……有人统计过，知青总数大约相当于中国当时城镇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知青经历了特殊的婚恋历程，遗留问题多，婚变比例大，对子女影响深，由此也可以看到文革影响当今中国一代，甚至相关几代人人生的又一侧面。

## 3. 文革与家庭关系

文革时讲究“亲不亲，线上分”，意即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亲人之间也要视所谓“阶级”，“路线”定亲疏。由此引起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揭发批判，夫妻反目，婚姻变动，家庭解体，亲子脱离关系的事（血缘关系本无法脱离，与父母脱离关系是荒谬时代的产物）到处可见。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甚至有子女动手打死或参与打死父母，后来悔恨终生的。

文革时期的多子女家庭，有的由于兄弟姐妹下了乡，其他孩子得以留城，同一家庭几个子女的人生道路和境遇因而大不相同。多年远隔千里，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亲情疏离，下乡的家庭成员返城后成为弱势者，在住房，经济条件等各方面与家人有很多利益冲突，近年又纷纷下岗，上不能奉养年迈的老人，下不能供养正在读书的孩子，父母有养老金的甚至还要倒贴。造成很多家庭成员间关系不和谐，不正常……

性、情、爱、婚姻、家庭、天伦之乐……当代千百万中国人，怎样遗失了与生俱来的人生许许多多美好福份？

### 三，文革与理想

文革的暴虐摧毁了一代人原有的，个性化的，以兴趣、爱好、特长为依托的人生理想。“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文革烈火，毫无商量的像是要把所有的人，要么，铸造成职业革命家，要么，烧成灰烬。

文革真的在极短时间内，造就了那么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以成为职业革命家为毕生理想的狂热而真诚的青少年。

十年与草根阶级甘苦与共的底层生活，让他们认识了真实的中国；读过马列再读“灰皮书”，使他们完成了自我教育；走向“民主墙”，走上“四五论坛”，走在“新时期文学”的作者群里，走在“八九”民运的游行队伍中，走啊走，直走到和他们青少年时代景仰的马克思一样，成为流亡天涯的“世界公民”。

毛泽东三十五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为青少年一代指明方向之后，那些执著于建立人类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怎样被一步步造就成共产主义掘墓人，肯定是本世纪学者作家谈不完的话题。

### 四，文革与信仰

（听一段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录音：〈被接见的红卫兵拚尽全力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一主一席！”……〈现场解说〉：我们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都能见到影子，但尤其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登峰造极，大概只有华盛顿D C大屠杀博物馆中人们向希特勒欢呼的记录片中场面能与之相比。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忘的了，那时的“天天读”，面对毛泽东画像的“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前的三敬三祝”，以及跳“忠字舞”……何等的狂热，何等的敬虔……

一九六六年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是什么关系，当时的中国人到底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学研究专家学认为，毛泽东当时向中国人施行的无异于催眠术；文革将个人崇拜推向极端，有宗教研究者认为，共产主义带有“准宗教”，“准信仰”色彩，或者说是一种“伪宗教”，近年也常有人称之为“邪教”。

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后来有机会接触宗教的时候发现，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呼唤调动出人的信仰能力，但是由于这种信仰所指向的信仰对象不是真正的超越者，

而是与信仰者一样、同样有弱点的人。信仰者一旦发现这一点，即会感到真诚被践踏后的痛楚，信仰坍塌后的幻灭，以及信仰失落后的真空。

与经历过文革的人谈信仰，常会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有人说，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我被伤透了，别再和我谈什么信仰；也有人说，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曾经被伤透过，知道把人当神敬拜会带来多大的祸患，现在特别体会到信仰危机是当今中国最深刻的危机之一，所以深感人需要纯正的信仰。他们真诚而迫切地寻求超越，寻求终极关怀，寻求绝对真理。

## 五，见证者

求学、婚恋、理想、信仰这几方面对于人生之重要，毋庸赘言。十年文革给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到底都注入了些什么，又夺去了些什么？如何影响当事人的一生？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细腻的大题目。

以上仅粗浅概述，挂一漏万。

文革对当代中国人人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层面也很多，除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诸如：思维方式（例：非黑即白；热衷于构筑体系，终极真理，文过饰非，无忏悔心，羞耻心，自己一贯正确，别人都是异端，错误路线代表…），行为方式（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暴烈极端，草菅人命，像今日对待法轮功…），人际关系（例：你死我活；动辄揭人隐私，党同伐异，热衷于拉山头，当“山大王”…）等等。

从文革爆发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当年的初中学生，现在也已五十岁开外，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正一茬茬离开人世。抢救记录当事人的回忆，收集整理文革史料，时不我待。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和理解文革时所发生的事情。

刚才有位年轻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文革中，是谁指使红卫兵打人杀人的？”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有正常思考力的人很自然会提出的问题，三十五年了，还没有像样的答案，仅仅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作多少篇论文！政治学家也许会论“挑动指使”，社会学家也许会论“社会导向”，“人性的弱点”，心理学家也许会论“心理暗示”……文革研究的题目还多得很，文革研究是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的大工程，而且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后人的研究将会更客观公正，但他们需要足够的第一手资料。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见证者。文革研究与八九“六四”研究以及当代中国历次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必须先要像拼板拼图，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尤其现在，文革研究在大陆还是禁区的时候，文革见证者特别有责任，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把自己经历的一切说出来，记下来。为了历史，也为了后人。在进一步收集整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文革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进行。

回忆三十五年前的往事，我有义务见证历史，研究文革，但是，我没有资格仅仅扮演一个控诉者。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不是我自觉的选择，不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我若出生在另样的家庭，所作的也一定和那些打人的同学一样。十五岁时的我，不是不想加入其中，是因为被认为不够资格，才成了被打的。

从那时，直到后来的岁月，我们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生，心灵与生命中，发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

我们有责任如实回忆，翔实记录，诚实忏悔。

□ “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发言

~~~~~

【坎坷人生】

崇拜的代价  
• 冯骥才 •

1967年女21岁，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男25岁，B市作家协会干部

◇ 上部份：崇拜的痛苦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二十岁时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生日。二十三日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喳，兴奋得眼睛直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份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情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写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

。无比幸福的感觉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给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饿，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咪咪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模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像，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爬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

题，只有他政治上乾淨，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连这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帐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定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着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岗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份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呵！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个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



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有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因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候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咣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声一点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们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里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线，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

。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乾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 ◇ 下部份：崇拜的回报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想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话：“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呵。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闪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也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辗轧过草地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已。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蹿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呵。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们被派下去劳动，政

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二十八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醒，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在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呵。

五月端午节；二十八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村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可是我这时才二十四岁呀！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 原载《一百个人的十年》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